

第三章 内战中的徘徊(1927-1931)

一、离军拥蒋

1926年10月10日，国民革命军在这个辛亥武昌起义的纪念日攻占了武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北伐战争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当日，陈铭枢就任武汉卫戍司令职务，维持武昌秩序。第四军以其辉煌的战绩，被人民誉为铁军。铁军的两位师长陈铭枢和张发奎，独立团长叶挺，都成了战功卓著的北伐名将。陈铭枢在军事上有勇有谋，军中评价说：“张发奎攻击勇猛，陈铭枢会守会攻”，“向华（张发奎）师长之蹈厉无前，真如（陈铭枢）师长之指挥若定”。^[1]

攻下武昌后，江西战场仍很吃紧。第四军第十、十二两师复奉命各编足两团，组成混成师，由师长张发奎、副师长蒋光鼐指挥，增援南浔路。混成师协同各军，击溃孙传芳，11月间，胜利回师武汉。这时，为了适应战争区域扩大的需要，国民革命军各部进行扩编，蒋介石于12月间委任陈铭枢出任第十一军军长，以原来的第十师为基础，分编为两个师，以蒋光鼐为第十师师长，范汉杰为副师长；以戴戟为第二十四师师长，蔡廷锴为副师长。同时，张发奎已先行升任第四军副军长，在汉所部也正在扩编。

这时，国民政府内部左右两派的斗争尖锐起来，尤其在迁都武汉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蒋介石通过廖仲恺被刺案和中山舰事件，逐步集中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在北伐战争过程中，蒋介石以军权凌驾于党政之上，实行个人独裁的面貌逐渐暴露，遭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强烈反对。左派力图通过提高党的权威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倾向。同时，蒋介石和唐生智之间，在军事实力的角逐上也存在着矛盾。唐在北伐的过程中不断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尤其在占领武汉之后，他的第八军发展为4个军，还要收编杂牌部队，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为了控制唐生智势力的发展，蒋介石原主张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尽快迁往武汉。1926年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作出了迁都武汉的正式决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分批北上。12月13日由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成临时联席会议，代行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职能，确定定都武汉。但蒋介石在南昌又出尔反尔，于12月间，把张静江、谭延闿等要员从广州接到南昌，又截留了取道南昌去武汉的党政要员，擅自于1927年1月3日在南昌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非法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后来，蒋介石又要求武汉成立政治分会，解散临时联席会议，并主张原定于3月1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改在南昌召开。遭到拒绝后，蒋于1月11日亲自到武汉游说。

陈铭枢自第一次东征之后，和蒋介石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社会上被人们视为亲蒋的人。在武汉时期，张发奎和唐生智合作，排挤陈铭枢。但事实上，陈同左派的邓演达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是一个重私人感情的人。在大革命时期，群众运动蓬勃发展，但也往往出现无序现象，这实际上是一种无政府现象，很难为其他社会阶层所接受。陈铭枢在长

沙演说时，就表明他不能接受这种一时无序的群众运动方式。为此，他在1926年11月武汉卫戍司令任上，就工人运动中捕人的问题向蒋介石报告说：“查近来案件中，发生有湖北学生联合会及湖北总工会私擅逮捕人民送部惩办之事，此种举动不仅触犯刑章，凡与他人的自由、地方之治安，均有妨害。若不加以纠正，将来流弊滋多。”要求蒋介石明令禁止。对此，湖北省总工会于11月19日致函陈铭枢责问说：“贵司令系革命军人，当然了解国民党扶助工农之意义，其违反工人利益、破坏工人团体、摧残工人运动之工贼，即属反革命分子，是工贼固为工人之敌，亦即党员与革命军人之敌。此种公敌，若不予以肃清，革命前途影响实大。”^[2]在左右两派的斗争中，陈铭枢看到武汉方面提高党权的反蒋部署，忧虑革命运动的分裂，因而沉默不语。武汉的其他实力派唐生智、邓演达、张发奎，都是倾向联共反蒋的。当然，他们后来的实际政治倾向有很大的差别。因此陈铭枢在武汉处境已经很困难，蒋介石到武汉时，陈正因病住在日租界同仁会医院静养，这大概也是一种逃避政治纠纷的手段。13日到17日间，蒋介石曾三次同中央委员或唐生智等人一起前往探视。蒋曾问陈：“武汉的社会秩序和治安情况怎样？”陈回答说：“天天游行罢工，我作为卫戍司令，也无法维持，很想辞卸此职。”蒋劝他说：“照现在这种情况看，谁来干也维持不了。你还是暂时勉为其难，以后再说。”^[3]

当时，陈铭枢还是希望国共合作，把北伐的大业进行到底，不希望革命队伍出现象太平天国那样的分裂。但他一方面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看不惯群众的过火行动，自认为“万一国共分裂，发展到各行其事的话，我是国民党员，我是要向国民党归队，不跟共产党走的。”另一方面对唐生智的投机革命，发展个人势力不满意，认为唐一旦上台，还不如蒋介石。所以，他始终不愿意附和反蒋的党权运动。这时，李宗仁来看他，对他说：“这样下去，岂不是成太平天国第二吗？现在前方的将领，对武汉的作法也多有不满，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想把政局拖到什么地方去，真叫人怀疑。”陈铭枢就把自己和李宗仁的看法去和邓演达、张发奎交换意见，但双方仍各持己见，无法调和。邓对陈说：“蒋介石既违反总理政策，又个人独裁，已成为新军阀，难道我们还要拥护他吗？不反蒋介石如何将革命进行到底！不拥护工农利益，还谈什么革命！不淘汰革命战线上的腐朽分子，革命是永远不会成功的。”邓又对他说：“革命的基础是工农群众，光靠枪杆子是不行的。至于领导，汪先生也快回来了，今后要提高党权，实行民主，不能再走蒋介石的老路了。如果还有人想再走这条老路，我们也要把他打倒。”当时，武汉方面正在呼吁汪精卫回国复职，企图以汪制蒋。陈铭枢对汪精卫也不信任，没有接受邓演达的意见。^[4]

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原本定于2月21日在武汉召开中央执监各委员联席会议，一面将临时联席会议结束，一面宣布党部、政府即日开始办公。但南昌方面的委员没有如期到会。21日联席会议上经讨论议决，临时联席会议仍应宣告结束，党部、政府宣布即日开始办公，并建议于3月1日以前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22日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接受了这一建议，即分别通知各地同志如期到会。24日，陈公博代表南昌方面来武汉视察，

武汉方面当即将开会议决致蒋介石函一封，说明武汉方面的立场，并抄送全体会议提案大纲，以便南昌方面了解武汉方面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武汉方面派谢晋和陈铭枢带了这封信，与陈公博一起到南昌去和蒋介石商谈。当时，谢晋是共产党员，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代表左派，他和谭延闿关系很好，陈铭枢代表国民党。武汉左派方面派出陈铭枢，一是想利用他和蒋介石的良好关系，打消蒋的顾虑；一是希望趁陈不在之际，争取他的部下向左转。陈铭枢明知如此，仍然和谢晋一起前往南昌。临行前，他对蒋光鼐作了交代，要蒋光鼐密切注意部队动向，以免发生意外。陈和谢到了南昌后，谢住在谭延闿那里，蒋介石就单独和陈铭枢谈话。陈向蒋表示：“现在正是北伐军事紧张时期，大家都希望总司令以大局为重，还是共同团结起来继续北伐为上策。”蒋却愤愤地把共产党和武汉国民党左派申斥了一顿，并对陈训诫说：“你今后怎么办？你要分清是非，不要忘记自己是国民党员。”陈铭枢迟疑了一会，回答说：“总司令对我说的话，我回去再考虑。我可以向总司令表白，我是不会跟共产党走的，不过部队的情况也很复杂，我也很苦闷。至于邓演达他们的行动怎样，我无法影响他们，但他们也不能影响我。唐生智是个野心家，确是总司令所说的准共产党那种人，我与他很少接触。在邓演达方面，我一定对他转告总司令交代的话。”最后，蒋介石对他嘱咐说：“我正布置前方军事，决不能去武汉，会由他们去开，至于谭主席他们去不去，一切由他们自己决定。你自己也要好好考虑自己的前途。”^[5]陈在拜访了谭延闿、张静江、李烈钧之后，就独自先行于3月3日回到武汉。^[6]

由于蒋介石迁都南昌的理由太不充分，至3月6日，在南昌的委员谭延闿、何香凝、李烈钧、丁惟汾、陈果夫等5人和谢晋一起启程赴汉，仅蒋介石、张静江、朱培德没有来。当谭一行于7日到汉后，下午6时，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举行预备会议，陈铭枢也列席了，和李烈钧坐在一起。在这次会议上，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占了上风。会议猛烈地抨击了蒋介石的个人独裁，要求罢免他的一切职务，情绪激动之时，也涉及人身攻击。陈铭枢看到革命队伍的分裂已不可避免，对武汉左派的立场十分不满，他和李烈钧都摇头叹息，不到终场，就退席了。临分手时，李对他说：“这样下去，恐怕北伐完了，北伐完了。”陈铭枢马上回到军部，即召见副军长蒋光鼐，同他谈了会议情况，对他说：“形势如此，我的处境不利，必须离开，否则可能发生意外。关于部队的事，以后请你负责。”^[7]随后通知蔡廷锴、戴戟等人，作了关照。陈铭枢当天就改装乘日轮赴九江，转去南昌见蒋介石，走上了拥蒋反共的道路。

陈铭枢走后不久，邓演达在3月12日即到第十一军训话，16日晚，又应张发奎的要求向第四军、第十一军军官训话。邓说：“自这次党权运动发生，陈军长走了，陈军长为什么要走，就是他不晓得革命，不明了革命，没有革命的决心。他一方面是要带我们的军队，同时一方面又不能将封建的思想感情打破，所以他不能不走了。我们革命的军队，没有决心革命的人是不能带的，我们第十一军、第四军要永远为党流血……我们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赶快走开，不要犹豫不决。”^[8]邓演达是陈铭枢的好朋友，他知道陈这个人太

重私人感情。不久，蒋光鼐、戴戟也离开了部队。武汉卫戍司令一职由唐生智接手，第十一军由张发奎代管，蔡廷锴调任第十师师长，叶挺任第二十四师师长。

陈铭枢从武汉到南昌后，即去见蒋介石，蒋问他：“你是否与蒋光鼐取得联系，把部队拖出来？”陈回答说：“在目前还是不联系好。否则他们会采取意外行动，反而不利，我相信他们将来都是服从总司令的。”陈铭枢就留在蒋的身边，为蒋出谋划策。蒋马上给了他3万元的支票，作为他的生活费和活动经费。与此同时，陈铭枢也给在广州的李济深发了一个电报，向他报告了自己离开武汉到达南昌会见蒋介石的情况，并请他采取一致行动。这时候，武汉方面，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免去了蒋介石的中常会主席、军委会主席、组织部长等职务，反蒋已经明朗化。蒋介石在自己的军事控制区域内，也开始了清党反共的部署，待北伐军于3月底占领上海、南京之后，一方面发动了“四·一二”大屠杀，镇压工人运动，捕杀共产党员，一方面在南京另行组织政府。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成立，胡汉民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军队总司令。同时，蒋介石又宣布军事委员会由广州迁到南京，重新成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由吴稚晖任主任，陈铭枢、刘文岛为副主任，于4月26日就职，实际上由陈铭枢负责宣传工作。陈还兼任训练部部长，发行《革命军日报》，主办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自任主任，以刘文岛为副主任。^[9]在宁汉分立时期，陈铭枢成了蒋介石的宁方要员。

当时，留守广州的李济深、桂系的李宗仁都支持蒋介石，由于蒋的第一军也不稳定，第七军被调到宁沪一线。李济深在南京政府组织之前，即4月初，也被蒋请到上海商讨时局对策。陈铭枢当时正在上海，就去看望他。李济深对他陈了一席话，典型地代表了他们的政治观点：“今天的分裂不是意外，而是意中。现在已各走极端，已无妥协的余地。我们国民党人，当然只有拥蒋合作反共。不过蒋介石今天的地位是相当脆弱的。党内许多人反对他，即以他一手栽培起来的第一军，因为内部共产党人多，将领严重左倾，薛岳也左倾，以致指挥不灵；连军长何应钦也想辞职；此外第二军、第三军也反对他。在南京惨案之后，程潜也赴武汉。蒋自己真是束手无策，如果不是我和李、白帮助他，全面清共就无法进行。蒋的作风有问题，他把中国的革命当作个人的事业来看待，这是绝对错误的。本来，要把他打倒是很容易的，但把他打倒后，中国革命马上不可收拾，结果只有为北洋军阀和共产党造机会。而且从现状看，要找一个人来代替蒋介石再来领导北伐，也很困难。汪精卫仍然向左转。他也一方面是不识时务，一方面是不愿意和胡汉民、蒋介石合作。而共产党又捧他出来号召，所以他甘心与共产党合流，不过他将来一定会觉悟的。因为今天的情况已与北伐前不同，北伐前共产党尚未壮大，他们要利用国民党来扩大声势，那时国民党仍居于主导地位。而今天武汉的情况恰恰相反，已是共产党居于主导地位，他们虽然武力不足，但民众有基础。鲍罗廷依仗第三国际，成了太上皇，他在幕后操纵指挥。谭延闿、孙科这般人，无足轻重。至于唐生智、张发奎，他们自以为向左转就是革命，以为自己在反蒋高潮中成为革命英雄，实际上他们成为了共产党尾巴而不自觉。中国与苏联不同，

我们走苏联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如果孙总理活到今天，他也一定会改变政策。”^[10]这段话虽是陈铭枢在解放后的追忆，又经李任夫记录整理，不免会与事实有出入，但至少可以看作陈铭枢自己对当时政治状况的一种分析，而这种分析，是符合他们当时的心理的。

这时候，国共分裂，派阀林立，政局十分复杂。7月间，汪精卫也在武汉实行清党反共。中国共产党则实行武装暴动的方针，于8月1日举行南昌起义。而蒋介石在南京与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的矛盾也尖锐起来。8月初，蒋介石指挥所部北攻徐州失败，陈铭枢和蒋介石一起坐在火车上后撤。蒋在车上草拟下野通电，陈趁机向他提出忠告，很委婉地指出，蒋在上海拜青帮头子黄金荣为师，同杜月笙、张啸林等拜兄弟，这些作风同时代并不合适。这时，陈铭枢留在武汉的第十一军一度北伐之后，又奉命东下讨蒋，进攻南京。部队进抵南昌一线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南昌起义，时叶挺任第二十四师师长，蔡廷锴任第十师师长。蔡为避免部队瓦解而不得不附和起义。8月5日，蔡部奉命先行回粤，进占抚州。第十师开出南昌进抵贤县之后，蔡廷锴即实行清党，解除了共产党员的军官职务，礼送共产党员出境。第十师遂独立行动，将部队集中到江西河口。陈铭枢获悉第十师的动向后，即奉蒋介石的命令，前往河口收回接统第十师。但当他偕范汉杰到杭州后，即获悉蒋已不得不于8月12日宣布辞职下野。陈铭枢作为蒋派的一员，即称病回沪，请辞第十一军军长及政治部副主任职务，并饬副军长蒋光鼐代往主持。政治部就由军事委员会接管，吴稚晖、刘文岛也都已辞职。尽管军委会挽留陈任第十一军军长，但他仍于9月2日离沪赴日，进行调养。^[11]蒋光鼐则从上海携款10万元，到达河口军中。蔡表示拥护蒋副军长，请示今后行动，蒋即表示服从南京中央政府。这时，南昌起义部队正南下广东，李济深兵力不足，希望蒋光鼐、蔡廷锴假道福建率师回粤，拦截叶挺、贺龙所部。蒋、蔡即将部队恢复第十一军番号，并扩编为两个师，然后进军福州。第十一军于10月10日进抵福州后，与海军合作，消灭了当地的新编第一军，电请陈铭枢回部复职。陈接电后即从日本乘船回国，于11月2日到达福州，^[12]重握兵符，指挥第十一军，并且立即和李济深取得联系。李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后，一直留守广州后方，时任广东政治分会主席。蒋介石下野后，桂系掌握中央实权，而李济深和李宗仁、白崇禧关系很深。李表示欢迎十一军回粤休整。这时政局益形混乱。张发奎、黄琪翔所率第四军在南昌发生共产党领导的起义之后，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失去方向，决定回广东，得到老上级李济深的欢迎，于9月间回到广东。这时，国民党于9月16日成立特别委员会，宁、汉和在沪的西山会议派重新合作，改组国民政府，而汪精卫则被排挤出中枢要职。第四军这时在政治上倾向汪精卫，要求“拥汪护党”，已和李济深不同。李要求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出兵攻击南昌起义南下的叶挺、贺龙所部，而张、黄则要求李领衔通电反对南京政府，并在广州召开一次国民党中央会议，重新组织政府。双方无法达成一致。第十一军正准备回粤时，接得第四军军长的电报，表明第四军已先行回粤，这使第十一军回粤驻扎成为一个问题。蔡廷锴即向陈铭枢报告，意为：“第四军现已先行回粤，倘双方不谅解，难免又生内争，那时粤局更不可收拾了。”陈铭

枢表示：“你所说甚有见地，但我向各方运用，或可不至内争，请你放心。”^[13]于是，第十一军与控制福建政权的海军当局达成谅解，肃清盘踞泉州的由收编土匪组成的异己部队，向漳州、泉州前进，暂驻闽南。

正在这时，广东政局又发生变化。第四军的张发奎、黄琪翔支持汪精卫的政治主张，而李济深不同意。11月15日夜，张、黄请汪、李赴沪参加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解决党内纠纷。他们用兵舰送走汪、李后，翌日晚上即发动政变，改组广东政府。于是，南京政府下令讨伐张、黄，任陈铭枢为东路总指挥，指挥第十一军及第三十二军钱大钧、新编第四军第十一师陈济棠两部，会同西路黄绍竑部、南路徐景棠部，会攻广州。张发奎把所有部队调往东江、西江前线。中国共产党趁国民党内乱之际，于12月11日举行广州暴动。张、黄虽残酷镇压了广州暴动，但南京方面仍坚持要讨伐他们。第十一军主力到达松口。12月17日，陈铭枢在汕头与陈济棠、钱大钧、徐景棠等商议东、西、南、北各路军会攻广州的计划。张发奎、黄琪翔被迫下野，第四军由缪培南、薛岳等率领退出广州，集中惠州、河源一线。他们一度向陈铭枢接洽和平，但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陈认为这是张发奎的缓兵之计，因而决心一战。当第四军各部到达紫金、华阳、龙川一带时，第十一军前锋第十师已进抵老隆。北伐开始时的第四军两部，均以铁军著名，这时陷入内战。1928年1月2日，陈铭枢命令各部会攻龙川，4日起，两支兄弟部队在龙川一线厮杀，蔡廷锴部向许志锐师发起猛攻，将许师击溃。两军接战时，陈铭枢叹息说：“兵凶战危，非仁人君子不可以将兵，彼小孩辈意气用事，把军国大事作儿戏看，真可痛心！”^[14]蔡廷锴回顾这段历史痛心地说：“许志锐前乃本师之副师长，在河南回师武汉，始调接二十六师师长。当彼调升之时，曾调本师干部30余前往补充，此次自相残杀，所掳获及阵亡官长多为本师之旧部，当时见之无不痛心流泪。”^[15]此战后，陈铭枢随第十师向河源前进。这时，第四军军长缪培南率主力掣第十一军之背，进抵淡江墟集中。陈铭枢应钱大钧、陈济棠的要求，命令第十师回师老隆。9日起，第四军拚命反击，两军在岐岭血战，陈济棠任左翼，一触即溃，率部退走，使第十师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被第四军全力击败，退走紫金。幸黄绍竑、徐景棠两部抵达前线，向久战疲惫的第四军进攻，击毙许志锐。第四军向赣南败退，这场战争也就告一段落。

二、主持广东政务

2月8日，陈铭枢从兴宁前线经汕头、香港到达广州，参加李济深召开的有关广东善后问题的军事及政治会议。陈已于7日被国民党中央推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进省途中，即有将出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传言。在当天的会上，李济深即表示将辞去省府主席兼职，请陈铭枢继任。14日，陈就任省府委员。这时，蒋介石已于1月9日复职，2月2日举行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完成北伐大业。陈铭枢回到广州，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他在讲演中，一再表示要杜绝流言，反对分裂，力主服从中央。他又发表宣言，一方面主张广东“首先要肃清土匪共党，然后造建设事业，使劳资协调，促进产业发达”，^[16]一方面

表示要团结全粤将士，“俾革命策源地重整真能负担革命使命之军队，以从北伐诸军后，完成革命大业。”^[17]他以为国民党既能够统一全国，又能够镇压中共领导的革命。17日，在省府的会议上，陈铭枢动议，力主北伐。据报道大意说，“年前出师北伐，始而收复湘鄂赣，继而底定江浙，数月之间，大江以南，全隶国民政府范围，京汉线一路，且已到达河南，津浦线一路亦已越过徐州。藉使张发奎一军，非受共产党利用，捣乱赣粤，则北伐之师，可信现已直捣幽燕，黄龙痛饮。兹张发奎部业已完全退去，自当继续出兵北伐，竟前此未竟之志。况蒋介石现经到达徐州，与冯、阎会商，进行第二次北伐，粤方尤应急起直追，出兵京汉线，俾收策应之效。应于第八路总指挥下各军抽调两师或一师，组织北伐军，迅行出兵，仍以第八路李总指挥名义，指挥统率之。彼（指陈铭枢——引者）亦当亲率所部，随从出发。”^[18]为了和宁方协调，“陈铭枢派彭一湖前往南京，向蒋介石请示。同时，对于省府主席一职，陈铭枢表示谢绝，他说：“兄弟系属军人，对于政治，素乏学识经验，此次肃清张黄逆军后，决意专一心志，办理十一军军务，认真训练，期为本党有纪律有训练之军队。承李主席及各同志推举为省政府主席，实不敢当，决不就任。”^[19]3月9日，两广军政首领，由李济深领衔，陈铭枢也在列，发表时局宣言，表示：“吾人认为统一进行，在于武力积极之进展，故应促北伐之大计，早日完成，而吾党统治下之省区，同时亦必须扫除一切革命障碍，巩固后方，积极从事于建设，然后革命的真实意义，乃为充实圆满。”^[20]

但实际上，广东的一些军政大员更倾向于休养生息，巩固后方。同时，在2月底的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会议上决定，裁撤东西南各路总指挥，划分四大善后区，以陈济棠负责西区、陈铭枢负责南区、徐景唐负责东区、王应榆负责北区，进行“剿匪清共”。南区为高州、雷州、钦州、廉州、琼州、崖州及三罗地区，属贫瘠地区。这一区划，引起了第十一军将校的不满。第十一军本是战功卓著的部队，在北伐声中，并有扩编成两军的拟议。而这时，没有战功、本应受处分的陈济棠反而升任第四军军长，驻在广州附近的好地方，第十一军则又回到了北伐前的驻地，将士不免窃窃私议，认为高层“赏罚不明，偏袒偏私”。^[21]陈铭枢自己虽是李的部将，李又再三提议他任省主席，但两人之间，旧有的嫌隙看来并未消除。后来，蒋介石讨伐桂系时，陈铭枢曾披露自己的不满说：“铭枢悉粤军之力，与之削平大难，事定之后，所有兵权、政权悉举而归之彼系。”^[22]这里虽直指桂系的李、白、黄，而并非直指李济深，但李济深本是桂系的老大哥，这里对李也显有不满。不过，部队仍遵令调动，陈铭枢的军部，先是设在海口，后来移设在了他的家乡北海。

这时候，国民党内部进行了协调，准备进行北伐，完成打倒北洋军阀的事业。3月15日，李济深奉蒋介石电召，由广州起程前往南京，陈铭枢随行，19日到达上海。陈铭枢在对记者的谈话中表示：“因李主席赴京与蒋总司令筹商北伐，故亦随来。一方面个人也觉广东有许多事，都应在总司令赴前线以前，大家见面谈话，接接头。”当记者问到他是否参加北伐的问题时，他表示：“兄弟将与李主席担任广东后方一切事宜。”^[23]21日，陈铭

枢随李济深一起到达南京，蒋介石当晚设宴招待，并与之商讨时局。3月28日陈铭枢又和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一起乘军舰到达武汉，旋复赴长沙，与程潜、白崇禧等商讨北伐事宜，决定两湖军队组成5个纵队，由李率队北伐，白留守武汉，程坐镇长沙。完成了向各方协调北伐的任务后，陈铭枢回到南京，又和李济深一起于4月17日回到广州。接着他又风尘仆仆，于20日赴海口就任南区善后委员本职。

陈铭枢在南区巡视各属，他的本心，就是想安定地方，从事建设。他把共产党的武装暴动，看成是一支破坏建设的力量。他当时并不明白中共力量崛起的时代意义，而对国民党的前途很有信心。因此，他把镇压中共的革命，看成是完成国民党“革命”的必要途径，以巩固北伐军的后方。他一面安定地方，一面规划建设，计划用救灾赈款，修筑五指山黎境公路，以工代赈；计划筹设来往广州、北海的轮船，并建议在广州湾设立海关，维护国家主权。当时，李济深一直建议陈铭枢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但他始终坚辞不就，一意治军。5月3日，日军占领济南，制造惨案，杀我军民乃至外交人员。陈铭枢一向热爱祖国，对于日军的暴行，义愤填膺。为此，他特意集合第十一军军官教导队学生训话：“当此国难临头，我辈军人，应把这救国重任担负起来，你们应锻炼身心，誓与日本不两立，如不能为山东同胞复仇，为民国雪耻，以发扬我中华民族的精神，光大我民族的历史，你们可不要为十一军军官教导队的学生，更不配做十一军的军官！”^[24]一切教育都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对象。7月间，李济深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要求陈铭枢从海南回省，主持军政事宜，代理第八路军总部军务，代理省政府主席。省方且屡电催促，但陈仍以南区军务自任，没有回省就职。相反，他于7月22日从海口军部发出一份通电，请辞政治兼职。当时，北伐军于6月初攻占北京、天津，国民党胜利在握。各方面正从成立统一政府、减轻国家财政负担着想，创议裁军，蒋介石也提出了裁军计划及军事善后意见。为此，陈铭枢发表通电响应，电文说：“吾辈军人，今日唯一责任，自应同此主张，将所部听命减缩，实行兵工政策，移此巨款，以从事政治上之真实建设，则革命事业不为虚罔，开国史乘，乃著篇章。苟违此旨，则诚公敌，甘与共弃。尤有进者，军民分治，邳隆所基，军涉政治，则政治万古纷乱，不上轨道。分属军人，即应专力整饬部伍，充实军备，以固国防。宁利民生，固已无参与政枢之余暇。至如目前之兼任，则自为军事时期之过程，显非体要。蒋总司令主张军区既定，区长不得兼任省政府主席，见微知著，国之大计。铭枢则以为，凡在军职，亦当退政，专力治军，以奉国命，斯为楷则。铭枢忝领一军，任多力分，未遑专领，悔罪山积。张黄既定，已将部队裁减如额。现于役南区，日疲于地方绥靖事宜，誓于最短期内，肃清匪患，即整饬所部，静候中央明命编遣。现即谨将所兼广东省政府委员暨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一并恳辞。”^[25]

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以后，国民党内部各派调和矛盾，着手改组国民政府。这时候，出国数月的胡汉民回国到达香港。陈铭枢奉蒋介石的电召，由军中前往南京面商军事，也取道香港，与胡汉民会合，一起于9月3日到达上海。他主动斡旋蒋胡矛盾，再一次促成

了蒋胡的合作。^[26]陈铭枢还从自己的理念出发，附和蒋介石的裁军主张。但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发展很快，并占有北平、天津一带，成为蒋介石裁他人之军的障碍。陈铭枢奉蒋介石之命，于10月16日由南京北上，先到北平（国民政府已改北京为北平），再到天津，和白崇禧洽谈。据当时报载，陈的主要任务就是访问白崇禧，对白所谈内容，主要为三点：“（一）中央对党务有办法，请白不必悬系；（二）东北已以政治手段解决，北方军事善后，应如何办理，中央愿一闻白之意见；（三）希望白氏将来能以所部担任新疆一部分之国防。”陈铭枢认为：“革新国家，必使各军皆能由中央命令任意调防，军不成阀，此其始基。”^[27]但他太理性化了，不了解蒋介石和桂系及其他派系的矛盾，一时很难解决。后来，他回忆此事说：“其时我驻防广东南路，于琼州军次通电全国军人，倡议裁军，拥护统一，力主军权归还中央。后又北上，在香港与胡汉民同赴沪，企图以裁军主张游说各方。抵上海与李济深同住诸昌年家，晤李宗仁，他讥消我是傻子，并郑重地对我说：‘当今治天下非我们军人不可，长衫客是不行的。’到南京见蒋介石，他对我的主张当然很喜欢。到北平晤白崇禧，见其气焰之盛，使我对裁军问题不能开口。盘桓几天后，又在天津与傅作义见面。后取道武汉返南京，复与李宗仁见面。。我已知李、白同一鼻孔出气，无必要再同他们谈裁军问题了。”^[28]他于11月3日从北平到达武汉，再与李宗仁洽谈（回忆录说在南京有误），10日回到南京向蒋介石复命，据说，“尚保证其（指李、白——引者）必无他图，中央亦焕然冰释矣”。^[29]

当时，李济深虽系粤军领袖，但他是广西梧州人，在李、白、黄统一广西的活动中，给予很大的支持，因而在社会上被视为桂系的老大哥。在省籍情结很重的当时，他的粤籍部将们总和他有点距离，而桂系在打击张发奎的粤桂战争中也扩大了在广东的影响和军政实力。蒋介石和李济深之间也一直有矛盾，陈铭枢曾居间调和，当蒋和李宗仁的关系紧张起来的时候，蒋对李济深也就不放心。所以，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的一些要人，就力劝陈铭枢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也就答应了。陈铭枢和李济深于10月17日从上海起程回粤后，国民党中央就于21日批准李济深辞去广东省政府主席，而指定陈铭枢任省主席的职务。陈铭枢因为在香港滞留时，突发盲肠炎病，在颐养园由德国医生动手术，因而推迟了回广州接任的时间。

1928年12月19日，陈铭枢病愈后在广东省政府礼堂举行了就职典礼，李济深在致词中希望他“毋欲速”、“毋贪多”、“用人行政，勿事更张”。陈铭枢则针对广东省政中的问题，发表了题为《今后广东省政之建设》的就职演说。他提倡法治，主张“政治完全公开，与人民以共见；一方面敬谨以受党的监督裁制，一方面以诚意接受人民的监督批评。”在财政问题上，他表示要减轻人民负担，一切税收按财政原则予以整理，剔除积弊。在用人问题上，他表示要按照孙中山制定的考试制度，“实力奉行考试院制定的规程，以为用人的标准程序”。公开性和标准化是他的两点施政纲领。他要把广东省建设成一个模范省，表示“广东在革命的时代可以作革命的策源地，在建设的时代似乎也可以作革命的策源地”。^[30]

陈铭枢接任后就力图振奋精神，有所作为，首先整顿机关作风。本来广东人习惯喝早茶，上班姗姗来迟，他规定今后8时上班，不许迟到。同时，广东赌博成风，他规定禁止机关人员打麻雀牌赌博。这些措施，在省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1929年11月，广东省举行了第一次县长考试，他亲自进行监督，并亲自进行面试，从400余名考生中，录取了10名及格者。他深感中国实业落后，受到列强侵略，因而在外交场合，要求列强放弃协定关税制度，同时，作为政府当局力主尽力扶植民族工业。他忧虑广东实业的衰落，曾亲自赴顺德考察蚕丝业，并赴浙江考察，以作借鉴。在他任内，增加了政府改良蚕丝的经费拨款，制定了奖励蚕丝业和蚕种改良专家的条例。他筹划了翁江水力电站和士敏土厂（水泥厂）的建设。他尤其关心交通事业，尽力扩展全省公路网，除东南省道干线外，各县都有公路局，由县长兼任，“各县路事之繁，倍于往昔”。^[31]在他任内，广东省增加了教育经费，加强了对中小学教师的培训，扩大义务教育。他亲自理财，在军费膨胀的情况下，仍努力整顿金融，从事建设。他尤其重视文化建设，利用职务之便，筹措资金，接办上海神州国光社，成立由欧阳予倩主持的广东戏剧研究所，筹办广东艺术学院和大剧院。他曾指令广东省财政厅拨款给马思聪，前往菲律宾，为戏剧研究所聘请乐队队员，添购歌剧剧本乐谱。他领衔募捐1.6万元，扩建自己的母校为合浦第五中学（即公馆中学），建设中学图书馆，在故乡璋加村创办真如小学，并捐资创办合浦医院，等等。

当时，陈铭枢在政治上主张法治，实现军民分治，培养地方自治的精神。他曾说，在1930年10月间举行的国民党四中全会上，“大家讲起刷新政治的话，蒋主席问各人有何见解，胡先生（指胡汉民——引者）便说出八个字来，这八个字，兄弟觉得简单精当，哪八个字呢？就是‘军民分治，党政合作’”。^[32]陈铭枢在广东省政府主席，就没有再兼任军职。他把自己的军队让蒋介石调往北方，结果吃了亏。他同意胡汉民缩小省区以培养人民自治能力的主张。在经济上，他关心民族工业的发展，而且，特别强调民族工业的重要地位。他主张“国家资本所办的事业，在目前只有造成直接生产的条件，不是做直接生产的本体，如完成公路，设办模范事业等等。私人资本则在法律和政府在政府力量保障之下，去开发所有的生产事业。所以，政府办建设是吃本的，其目的就在于求人民赚钱。人民赚钱，生产力自然增加，政府便会得利益。所以，建设如果为着要政府赚钱，那是一件大错误的事。”^[33]他于1930年10-11月间，在上海和荣宗敬以及广东籍的民族资本家谈话，深深感到民族资本家的爱国精神。他说：“凡是经营工业或是行商而兼任工业的，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比较一般普通商人尤为痛恨。他们对于帝国主义的反抗，比较热烈。所以，兄弟很希望中国现在能够多出些经营工业的人，来踏实地做些反帝国主义的工作。”^[34]当时，国民党正大力发展国家资本，而实际上正如后来马寅初所说，在国营的名义下发展官僚资本。陈铭枢对国营企业作用的见解和方针，和南京当局是不同的，这是一种有远见的现代意识和民主精神，这也是为什么陈铭枢能够在后来走上抗日反蒋道路的重要原因。

1930年10月10日民国国庆的时候，陈铭枢在演说中总结了执政两年的经验，对建设

难以进行，深感负疚。他说：“铭枢自十七年十一月受任省府主席，于今几及二载，言及军政之关系，幸有八路将士之公忠体国，匪特无以军制政之嫌，且常获分工协力之益。至于政治之本身，则无日不感觉惭愧与痛苦！溯其要因之所在，厥为促成统一之所牵累。以致财政竭蹶，百事难举……盖因一年中，讨逆之故，在十八年度，即军费一项，每月平均数目，总在410万元以上，超过国库纯收约1730万元，国库不敷之数，则向省库拨借。十八年三月至十九年九月上半月，计共拨借3290余万元。省库而又不敷，遂至预征钱粮、厘税，发行军需库券，举办产业借租，但凡可以筹款之法，几于应有尽有。以如此牵累之财政，又安望积极事业之创行。凡兹讨逆与财政之困苦，诚不能不举以为我粤人告也。至关其他诸务，溯铭枢就职之始，曾以守法、公开四字，无人无我，无私无隐，与省府委员互相勸勉。两年以来，在民政方面，选人任事，参用考试，绝无以行贿而得官，亦无以权要私情而受职。凡官吏之稍著成绩者，莫不专重其职位，使久于其任，且以简缺升繁缺，倘遇违法之污吏，一经查觉，从严撤惩，略无瞻徇。即在财政方面，按月收支公布，未曾新兴一税，且于麦粉、蚕茧、土布等税厘，土台、纸把等台厘，铁路、电灯、旅馆等附加捐款亦已先后减免，比之上年度月收计减20万元。他如建设方面，关于公路、农、工、渔各业，及士敏土厂等费，在十八年度比之上年度亦约增200万元。总计全省已成现成之公路约13000里。即于教育经费，亦约增40万元。凡此虽无巨善之足述，然于济难除弊之困状，稍伸兴业劝教之微意，其用心亦至苦矣！”^[35]翌年伊始，陈铭枢即发表了《广东民国二十年行政计划之旨趣》，表示在民政方面要“促成自治”，在财政方面要“要求中央严格划分国省税收支，并筹备划分省与县市地方税，分别办理”。而关于建设方面，他计划：“1、限期督促东、南、北、韶、坪、琼、崖各公路之完成、2、完成士敏土厂，举办主要工业。3、改良农产、蚕丝，推广植林，开发矿产，提倡渔业。4、促成粤汉铁路，筹建中山港。5、整理各县县市政。6、废除苛税，明订保障，妥处劳资纠纷。吸引华侨及境内之资本，扶植人民之兴业。”关于教育方面，他计划：“1、推广幼稚园小学，并筹办义务教育。2、整理省立中等学校，取缔公立县市中等学校，采行全省中等教育会议决议以充实整齐为主，提高程度，严格训练，并酌依地方需要，改设农工职业班次。3、选派优秀学生，留学外国。特重实业科目，并严订考察服务之限制。四、清理学校校产，及地方教育经费，严订保管办法。5、扩大民众教育及识字运动……6、提倡体育，扶植戏剧、美术与音乐之改进，并谋其平民化。”^[36]很有点雄心勃勃。

三、迷惘的抉择

陈铭枢在接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之后，依据自己的政治理想，期望国家统一，实行政治民主，从事经济建设，因而响应蒋介石的主张，着手缩编军队。他把第十一军缩编为一师一旅，以蒋光鼐为第三师师长，以蔡廷锴为独立旅旅长，自己则交卸了军职。1929年3月，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陈铭枢继李济深之后，经香港准备前往上海，转南京出席大会。不料，3月11日晨，他所寓居的香港英皇酒店失火，他从睡梦中惊醒后跳楼逃生，

不幸跌伤右腿，夫人朱光珍也同时受伤。于是，他不得不在香港皇家医院治疗。从此，他的腿落下了残疾。

正在这时，蒋介石和桂系的矛盾又激化起来。1929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召开了编遣会议，蒋介石企图通过编遣全国军队来削弱其他派系。会议虽然通过了一系列决定，但实际上各派的矛盾更加深了。当时，李宗仁、白崇禧的广西原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发展为第四集团军，散处河北、天津、武汉、两广一带，广东政治分会主席、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和桂系关系密切，桂系的军事、政治势力深入广东。蒋介石通过支持湘省主席鲁涤平来制约桂系势力，使其首尾不能相顾。桂系控制的武汉政治分会遂擅自决定免去鲁的主席职务，而以何键继任。这一着正中蒋介石的计，蒋于是以中央的名义对桂系名正言顺地提出责难，认为政治分会无权任命地方长官。双方调兵遣将，剑拔弩张。滞留在上海的李济深，经蒋介石的电邀和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张静江等力劝，前往南京调解湖南事件，他表示湖南事件一定可以和平解决。结果，李济深于3月21日被蒋介石扣留、拘禁在南京近郊的疗养胜地汤山。3月26日，蒋介石即下令讨伐桂系。

蒋介石拘禁李济深，在广东军政界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事件发生时，桂系领袖黄绍竑正在广州，李宗仁也逃出上海，秘密前往广州，于24日召开军事会议，准备起兵。第八路军参谋长邓世增等人发表措辞强烈的通电，反对蒋介石，一方面要求释放李济深，一方面表示要以武力求和平。北伐胜利、国家进入建设时代的愿望，眼看陷于破灭，而太平天国洪杨分裂的教训，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蔑视。陈铭枢从拥护国民党中央、支持蒋介石统一全国的立场出发，反对仅仅因为一位军政领袖被中央扣留而兴师动众、发生分裂。24日晚，陈一面致电蒋介石，要求恢复李济深的自由，一面致电黄绍竑、邓世增，反对广东起兵反蒋。他呼吁：“吾人为促进和平计，只宜冷静斡旋，万无自为戎首，而迫天下于不得不战之理…犹望顾全大局，安党国、安任公、并以安四千万垂死之人，不胜大愿。”^[37]当时，在国民党中央的胡汉民也尚支持蒋介石，不赞成广东用兵。正在上海的粤军将领陈济棠和胡亲近，接受了蒋介石的疏通，回到广东，于3月30日在海虎舰就任广东编遣特派员，广东政治分会和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也同时撤消。这样，李济深在广东的职权实际上落到了陈铭枢和陈济棠的手中。同日，陈铭枢、陈济棠、蒋光鼐、陈策联名发表通电，表示拥护中央，希望休养生息，并声明：“李总长夙以蕲向和平昭示部曲，此次在京监视，为其部下者，应体念其环境地位，与素日主张服从镇静，使其心迹白于天下，而早日得复自由。倘不此之图，称病恫吓，无异坐实李总长罪状，而陷其生命于危险。铭枢、济棠等以秉承李总长和平之念为职志，敢以至大决心，昭告有众：粤省军队，为党国所有，不以供一派一系之指挥驱策；粤省之财，皆粤人卖儿贴妇之膏血，不以供一派一系之浪掷牺牲。其有谋不利吾粤而牵之入战争之漩涡者，皆粤人公敌。铭枢、济棠等唯力是视，特此宣言。”^[38]这样，粤系将领控制了广东，支持桂系的将领邓世增、徐景唐等纷纷离职。

在此期间，蒋介石通过政治策反、军事进攻等手段，把桂系在河北、两湖一带的势力

相继瓦解，白崇禧从天津只身逃回广西。至5月间，蒋介石通过各方面要求桂系通电拥护中央，措辞严峻。遭到桂系的拒绝后，蒋遂命令湘粤分道出师攻桂。桂系即成立护党救国军，主动出师攻粤，希望求得军事上的主动。粤方正出师无名，即以桂系进占封川、德庆为口实，进行出师动员。本拟撤消的第八路军也保留下来，而由陈济棠于5月6日就任总指挥。桂系一方面自西江一线进攻，一方面策动原在东江的军队起兵袭击广州。蒋光鼐、蔡廷锴各部，遂向广州集中，出发东江反击。5月中旬，桂系的进攻遭到失败，粤军以中央入粤支援各军为后盾，向广西进军。5月24日，陈铭枢经广东军政界的一再敦促，伤愈回到广州，重新亲理政务。他随即发表《敬告全粤父老书》，谴责桂系的分裂，拥护中央的统一，并表白自己的政治期望说：“人民若兵争久矣。求治之道，必先完成中央之统一，所有国军尽奉还中央，同时，地方驻在之国军与一省政治划然分离，然后一切设施始能自由发展。已往桂系之统治吾粤，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视一省为个人之战利品，今后唯一主旨，在不使地方为个人势力之争夺场，使此战利品式之政治不再发生。人有恒言曰：建设廉洁政府，吾更进一解曰：建设廉洁法治政府。战利品式之政治不能铲去，却无廉洁法治之可言。”^[39]

桂系失败以后，广东省政府委员会改组，陈铭枢仍任主席。这时候，他和陈济棠就成为广东的主要军政领袖，他要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的模范省。这个模范，按他的理念，首先是打破封建割据、服从中央统一的模范。他说：“现在广东的当局，谁也知道是陈总指挥和我两个人，如果以为广东是我们两人的地盘，便是荒谬绝伦的观念，万万要打破的。要晓得陈总指挥的军队，是中央的军队，陈总指挥是国家的统兵将领之一，兄弟是国家行政官吏之一。我们认清整个国家，还有什么地盘势力可言。广东是革命策源地，是极关重要的一省，要做到打破封建形势、铲除封建思想，现在就要从广东做起，立个榜样，为全国倡。”^[40]当时，蒋介石又击败了冯玉祥的挑战。陈铭枢对由蒋介石来统一中国还是抱有信心的，他还认识不到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不可能形成一股凝聚力，来完成中国的独立和统一。他把蒋介石的内战政策，看成是完成全国统一的统一战争。所以，他对广东军政界说：“要下定一个决心，相信我们的中央，足以镇压一切反动而有余，相信我们的中央，足以建设一个强固的新中国出来；相信我们中国，在本党指导下，他定会日近自由、独立、平等的境域。”^[41]

但事实上，国民党内部的争斗早就有增无减。8月间，蒋介石在打败桂系、冯系之后，采取强硬立场，召开编遣实施会议，以削弱各地方实力派的兵力，再次引起各派的强烈反抗。9月间，张发奎在汪精卫、陈公博的改组派的策动下，在湖北起兵反蒋，并率师南下。10月间，冯玉祥的西北军将领也通电反蒋。11月间，李宗仁、白崇禧再次策动广西旧部起兵，和到达广西的张发奎结合，组成护党救国军，向广西进攻。蒋介石采取了各个击破的策略，首先击败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各部，然后派兵入粤，支持粤军对付张桂联军，同时，攻击再次反蒋的唐生智、石友三诸部。粤军在张发奎起兵之初，即开始备战。11月2日，

陈铭枢亲自乘飞机前往梧州，帮助陈济棠部署军事。陈济棠在邓铿的粤军第一师时期，原是陈铭枢团的营长，陈铭枢离开第四团时，即将第四团交由陈济棠统带。所以，军中有此一层指挥关系，临战不际，不负军职的陈铭枢，在军事上仍有很强的发言权和指挥权。在梧州的军事会议上，陈铭枢针对张发奎喜欢军事投机的作战习惯，一方面要湖南的何键派兵追击，一方面估计张发奎会从小北江方向侵入，制定了诱敌深入之计。张发奎到达广西后，和李、白合作，原桂系将领吕焕炎重新倒向桂系。在广西境内的粤军不得不撤回广东境内，重新部署。11月27日晨，陈铭枢偕蔡廷锴、蒋光鼐、香翰屏3位师长赴北江视察防务。他决定在敌军意料不到的军田以西百里之线，构筑防御工事，部署重兵，并修筑好一条由广州到花县的公路，以利转用兵力，而将军事要地国泰、白坭、赤坭、芦苞等处，放弃不守，诱敌深入。12月初，中央军第三、第八师到达广东，开赴花县一线防守。8、9日间，桂系军队向赤坭一线攻击。张发奎部向两龙墟一线攻击，张桂联军一度小胜，但在粤军既设阵地前，攻击受挫。陈铭枢的第十一军旧部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在两龙墟和张发奎激战两昼夜，将张军击溃。

1930年5月间，粤军正向广西境内深入，屡与张桂联军接战，驻军贵县一线。这时，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爆发。张桂联军配合中原大战，向湖南进发。于是，陈济棠委任蒋光鼐为北江前敌总指挥，粤军向广东境内回撤。陈铭枢旧部蒋、蔡两师系粤军久经沙场、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但当时陈济棠系粤军总指挥，不断扩大自己的实力，虽然两军同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但自北伐后已自成系统。陈铭枢旧部本自觉功高，对陈济棠的自我扩张和指挥能力不满意。陈铭枢为避免两军相处日久，发生冲突，决意将旧部向两广境外发展。他后来回忆说：“其时，我因鉴于广东富庶之区，军队驻防过久，容易腐化堕落；且两个自成系统的队伍（我部与陈济棠部）同在一起，日久必会发生摩擦，甚至引起权利之争。况蒋、蔡两师将士，正锐气方刚，大足有为，自应面向全局，不宜安于现状，留恋桑梓。故当省内战争结束后，我即将此意向蒋、蔡说明，要他们恺切转告全体将士，作好精神准备，随时候命出发。”中原大战在即，陈铭枢即致电蒋介石说：“蒋、蔡两师已作好准备，随时可听候调遣。”5月31日，蒋、蔡两师自平乐入湘，尾追张发奎军。6月9日，攻占军事要地衡州，将张桂联军截成两段。19日进占耒阳。这时，张桂联军在前线失利，还军后撤，即将和蒋、蔡两师接战，而粤军兵力不足。于是，陈铭枢亲自向前线将领指示机宜。他回忆说：“时蒋、蔡军次耒阳，白部前锋已抵茶陵，预计两日内，双方即将遭遇。因敌我众寡悬殊，而李扬敬师刚过大庾岭，此正军事机动关头，我正筹算未决，忽接蒋光鼐电称：‘拟将兵力移向左侧方，扼守衡阳，撤去后方，使敌扑个空，然后与后续部队夹击敌人。’我心所踌躇者，至此始得解决，立即找陈济棠商量。殊他不同意蒋光鼐的计划，定要将部队撤回大庾岭，在九峰、坪石一带布防，凭险固守。我再三解释无效，乃即直电蒋光鼐说：‘你的计划好极！我军撤移衡阳，拊敌前进侧背，如猛虎在山，虽属险着，的是妙算。陈总指挥要你退回，是行不得的！万勿变更原计划。’”6月27日，蔡廷

锜师在衡阳东岸与南下攻击的张发奎部激战两日，将张军击败。29日，张军再次攻击衡阳，在七塘一线与蒋光鼐指挥的各部恶战，至7月1日张发奎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李、白所部桂系军队也败退广西。^[42]

粤军击败张桂联军，使蒋介石在中原战场稳定了阵脚。但恶战未休，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奉蒋介石的命令，开赴津浦线加入中原战斗。8月15日，蒋、蔡所部自泰安一线经恶战攻入济南，奠定了胜局。蒋介石以粤军功高，任蒋光鼐为第十九路军总指挥，以蔡廷锴为十九路军军长。他一方面给予虚衔，一方面架构重叠的指挥关系，作为控制非嫡系军队的手段。部队得不到扩充，装备也没有多大改善。陈铭枢部对蒋的忠诚，并未得到相应的回报。结果，蒋光鼐就任后，蔡廷锴一度不愿就职，于河南军次发出了一份自请编遣，以求解甲归田的电报。蒋也一度在家养病。中原大战结束后，第十九路军即被调到江西前线，参加“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战争。

陈铭枢自以为参加了完成统一的战争，天真地抱着军民分治、中央统一指挥、调动全国军队的理想，而一时看不到蒋介石并无博大的胸怀去消除地方割据的格局。他的军队离开了广东这块根据地，他也就犹如离水之鱼，难以在广东长久呆下去了。而他的军队失去了根据地，也就只能任人摆布。慢慢地他就知道其中的甜酸苦辣了。

1931年3月，国民党内又发生了政治纷争。当时，国民党决定于5月5日召开国民会议。蒋介石急于在国民会议上制订所谓训政时期的约法，而胡汉民表示反对，认为国民会议无权代替国民大会制定约法，并对蒋介石的独断专擅有所不满。结果，蒋介石竟动用武力，于2月28日晚将胡汉民扣留，并于3月1日送往汤山软禁，迫使胡汉民提出辞职。消息传到广东，引起了军政界极大的震动。广东是胡派势力集中的地方，陈济棠是胡派的军事领袖。这时胡汉民派的政治势力迅速向广州集结，并和汪精卫派、桂系等反蒋势力谋求新的合作。一个新的反蒋联盟正在形成。扣胡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曾有电致达广东方面，声言：“胡展堂先生对国民会议坚决主张不得议及约法，恐因此引起党国无穷纠纷，俭晚特与详细讨论。胡先生自以政见不合，愿辞本兼各职，并欲择居静地，谢见宾客，故于本日往汤山暂住。乃闻谣传扣留，殊觉失实。”^[43]陈铭枢本着以往对蒋介石实现统一的期望，反对广东将校起兵反蒋。他曾致电询问在江西前线“围剿”红军的十九路军将领，他们复电表示反对国民党内重起内争。于是，陈铭枢以出巡各县为名，于4月10日离开省城，躲避这场纷争。

其实，陈铭枢和陈济棠之间，早已发生矛盾，陈济棠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蒋、蔡两师为避免冲突，调出省外。据蒋介石说，两陈之间，为财政问题，也有矛盾。“陈济棠第八路军，不过五师人，照依陆军规制，每月所费不过150万元，而陈济棠在广东，凡中央地方款项皆由陈提用，每月要430万，尚有广西为其驻地所在，每月可收80万元，五师人每月500多万军费，此岂不奇异。因陈铭枢在广东任主席，对陈济棠此种行为，未免总有几句闲话，陈济棠因碍陈铭枢，不能予取予求，遂必去陈铭枢而后快。陈铭枢在广东，

因陈济棠种种掣肘，剿匪各事俱不能办，早有辞职之意，皆经中央慰留。”^[44]不过，陈铭枢在解放后写的回忆录中则说并无经济利益上的矛盾，粤省税收是蒋介石拨给陈济棠作军费的。但两陈有矛盾则是事实。同时，陈铭枢在任省主席期间，由于不能满足一些胡派人物的权利要求，而遭到胡派人物的反对，胡派支持陈济棠来制约陈铭枢。陈铭枢出巡之后，陈济棠信使四出，与原先敌对的汪派、桂系组织反蒋联盟。胡派要角古应芬和陈铭枢的朋友黄居素也联合起来，迫使陈铭枢反蒋。黄说：“对陈真如暂不必征其同意，等我们酝酿成熟，布置好了，他就会跟着走。”^[45]陈铭枢闻讯后于4月22日赶回广州，但局势已无可挽回。手无军权，孤掌难鸣，他只好于28日晚离开广州前往香港。4月30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以通电形式，谴责蒋介石“违法叛党，逆迹昭著”，弹劾蒋介石。5月3日，陈济棠即通电响应。

陈铭枢在当时国民党军政界，他的思维、行为方式是与众不同的。他从未刻意去经营自己的军事政治势力，在斗争的关键时刻，经常采取退避的方式，可见某种不明确的民主理念对他的影响确实比较深。他在解放后被戴上右派帽子后反省自己说：“我对任何事物都感兴趣，都想尝试，但对任何已得的东西（包括自己的生命在内）也没有什么爱惜，真可以弃之如敝屣。”所以，他信佛而谩佛，在军厌军，在政厌政。^[46]

不久，陈铭枢为了避免广东方面的疑忌，对记者发表谈话说：“本人对职务毫无留恋，此后欲赴日本、印度及南洋群岛考察经济政治。”^[47]5月12日，他离开香港到达上海，本想到南京一行，但应朋友之约，翌日晨即提前去国赴日，并有赴欧洲考察的计划。他到日本之后，陈济棠竟解除了省保安队的武装，并在黄埔与海陈铭枢的翁照垣团激战。陈铭枢闻讯，即去电责问说：“保安队区区数千人，为桑梓保卫，无关权势得失，竟必欲灭之，毁民保障。若以枢去国为未足，为此泄愤，则非枢所敢闻矣。”^[48]与此同时，陈济棠派师长香翰屏赴江西，游说蒋、蔡两师。香于赣州会见蔡廷锴后，即同赴兴国会见蒋光鼐，公开谈判，商讨两日，没有结果。当时，十九路军的军饷仍由广东发给，且军内多系广东籍人，所以将士对附宁附粤，争议不决。由于政局混乱，人心浮动，蒋、蔡决定从前线后撤，放弃兴国，回师赣州，静观时局的变化。蒋光鼐又离开军队到上海养病。

陈铭枢在日本期间，胡派、汪派、桂系等联合于5月27日另行成立国民政府，并发表宣言，要蒋介石引退。国民党内再次出现了分裂的局面。粤军调往粤赣边境，以防十九路军回粤。陈铭枢得悉十九路军彷徨无主，即于6月初从日本秘密回国到达上海，急于回到军中。蒋介石得悉陈回国，立即电召他赴南京商谈。两人见面后，蒋欢喜异常，告诉陈铭枢，要他到江西重领十九路军，将部队集中吉安，并出任剿赤右翼军总指挥官。蒋指示行动方针说：“‘共匪’不是短期所能消灭的，到进剿到一定阶段时，就要你担负起打回广东的任务。”陈铭枢深知十九路军将士不愿内战，但急于回军，就答应了下来。陈离南京前一天，蒋介石又把他请到中山陵园官邸，在悄无人影的花园草坪上安排了秘密的谈话。蒋表示：“国家前途的担子，已经落在我们的肩膀上了，我们义不容辞，要负担起来，就

必须合为一个整体，成为不可分的巨大力量。”他接着建议：“我两人可以效法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你以为如何？”陈对这种落伍的圈套，深为反感，就严肃地回答说：“桃园结义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今天用它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总司令！你现在是国家元首（国府主席），又是军队的最高统帅（陆海空军总司令），只要你能开诚心、布公道，政策方针昭示得正确，自然四海归心，一切忠义才智之士，都会不待招而自至。倘若不然，单凭极少数人的恩情结合，将示人心不广，反杜塞了贤路。因为现在是民主时代，人人都在看你的所作所为来决定对你的向背！”^[49]谈话就在尴尬的局面下结束了。陈铭枢虽然支持蒋介石多年，在社会上被视为亲蒋，但陈和蒋的关系并不深，又不是蒋的部曲，且在政治上有自己的主张。所以，在广东分裂的关键时刻，蒋要借重陈的力量，又拿出了结盟的老办法，其实只是一时的权术，结果话不投机而散。

6月9日，陈铭枢经九江到达赣州，重握兵符。这时，蔡廷锴已下命令要将部队开回广东去，先头部队业已出发。陈到达后，即接见所有主要负责人，把他的意图告诉他们，消除了大家的分歧，并按照他的指示，收拾行李把部队集中到预定的地区。事后戴戟对陈说：“你这位‘佛帅’真有办法，你没有来时，大家都闹得不可开交，你来了有说有笑地就把问题解决了。”^[50]陈铭枢向十九路军将士训话后，即发表佳电，以和平统一和“剿共”自任，11日，就任“剿赤”右翼军总指挥官。同时，他致电汪精卫等广东方面军政要人，呼吁放弃分裂的局面，支持蒋介石的统一。他诘难说：“试问蒋公即下野，公等以何术统一时局，弭消祸乱，天下皆看得极透，早知公等之不能矣。此己所不有，而徒求诸人也。又试问公等此时凑杂之内容与形势，以何术能求得本党之真正的民主政府之实现，此又天下人之能批评其不能矣。此己所不能无，而徒非诸人也。若统一无术，祸乱更甚，乃谓蒋公去，公等方能平共，三尺童子亦安可欺。”^[51]当时，宁粤双方，在反共问题上一致，蒋介石正部署第三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所以，宁粤双方只是互相戒备，而没有发生武装冲突。

不久，蒋介石指挥各军长驱深入苏区，围击红军。陈铭枢将指挥部推进至吉安，指挥十九路军深入苏区腹地，辗转寻战，但在红军机动灵活的转战中，只是疲于奔命，少有战果。陈铭枢感慨地说：“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52]同时，陈铭枢在“围剿”红军的战斗中，也深感蒋介石赏罚不公，军事指挥能力差。蒋调拨给陈统率指挥的各军，实际上仍由蒋直接下令，陈只能掌握自己的基本部队。而且，十九路军在广东方面断绝军饷供应的情况下，蒋介石也不予补给。同时，7月间，东北发生万宝山事件，日军蓄意挑衅，对日战争已在所难免。在这样的处境下，陈铭枢不能不重新考虑自己和自己的部队的出路问题——怎样使十九路军摆脱目前的处境，怎样避免对广东的军事冲突。这时，陈铭枢的好朋友邓演达来信和他商量时局。他们两人自武汉分手后，虽然政见不同，但仍保持私人友谊，经常密切联系。经过两人的密函往来，决定利用蒋介石要陈铭枢出兵图粤的机会，别开局面。同时，陈铭枢在广东省主席任内时，曾在南京和杨杏佛多有往来，参加杨组织

的骑马会，知道蔡元培的政治态度，因此，他又通过杨和蔡元培联系反蒋。据陈铭枢回忆说：“待江西军事告一段落，乘蒋调我攻粤机会，俟军队进入粤北，即急转潮、梅，占领东江和闽南一带；然后推蔡元培领衔，我与择生共同署名，发表对时局宣言，呼吁和平，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相号召；对宁粤双方则采武装调停办法，建立第三势力，以图控制整个局势。邓并通知我说：‘陈诚是他的人’。我同邓议议好后，即同蔡元培联系，立得同意，他并派其秘书杨铨（杏佛）、到吉安我军中密商。决定后，我又将全部计划通知蔡廷锴，并预先约好通讯暗语。其时，我认为蔡元培有政治威望，择生有群众基础，我有军事力量，我三人合作计划实现，定可开一新局面。”但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被捕，并被押往南京。陈铭枢为此发电报给蒋介石，要求释放邓演达，他明知犯忌，也要尽力而为。[53]

1931年8、9月间，红军反围剿三战三捷，而两广军队宣言讨蒋，正向湖南衡阳、临近江西的广东乐昌一线推进。蒋介石不得不调兵堵截，并命令进攻苏区备军撤退。第十九路军由崇贤撤向高兴圩。当9月7日蔡廷锴率军部和前卫旅到达高兴圩时，一直对敌情不明的十九路军突被红军主力隔断，军部被围。第十九路军由铁军发展起来，在内战战场上屡战屡胜，战斗力强，红军避实击虚，从未和它展开正面战斗。这时，红军屡胜之余，以为十九路军正在撤退途中，战斗力削弱，遂不待主力完全集中即贸然实施追击。结果两军血战三昼夜，双方伤亡惨重，蔡部几次濒临崩溃，蔡廷锴亲率残部巷战冲杀。由于十九路军战斗力强，各部逐渐靠拢，红军经不起重大牺牲，不得不主动撤退。蔡廷锴部因伤亡空前，又对红军去向不明，只得退守兴国，进行整补。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国难当头，兄弟阋墙，外御其侮，十九路军在陈铭枢指导下，开始选择新的道路。

注释

[1] 萧克：《铁军纵横谈》，《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

[2] 天津《大公报》1926年11月28日。

[3][4][5][7][10] 李任夫：《陈铭枢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武汉韵军政大事》，《武汉文史资料》1983年第4辑。

[6] 据汉口《民国日报》3月5日报道，陈铭枢“前晚乘轮返武昌”，并按该报时间报导习惯推断。

[8]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2日第3张新闻第2页。

[9] 据《申报》1927年4月27、29日、5月2日、8月21日等日报道。

[11] 据《申报》1927年9月2日，陈铭枢东电：“业于9月2日扶病首途，东渡就医。”2日似为预定时间。

[12] 《申报》1927年11月4日。

[13][15][21] 《蔡廷锴自传》第186-187页；188页；192页。

[14][24] 《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第9页；10页。

[16][17][18][19][20][23][25][27] 《申报》1928年2月17日；21日；25日；26日；3月16日；20日；8月9日；11月6日。

[22][29][39] 陈铭枢：《敬告全粤父老书》，广州《民国日报》1929年5月25日。

[26][28][42][45][47][49] 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

[30] 广州《民国日报》1928年12月20日。

[31] 据建设厅长邓彦华提案，《广东省政府公报》第95期第19页。

[32][34] 《陈主席在联合纪念周中报告》，《广东省政府公报》第 138 期，第 144 页；149 页。

[33][37][38][40][41] 广州《民国日报》1929 年 9 月 19 日；3 月 26 日；3 月 31 日；6 月 16 日；10 月 18 日。

[35] 《陈主席十九年国庆纪念感言》，《广东省政府公报》第 134 期第 9-11 页。

[36] 《广东省政府公报》第 140 期，第 135-136 页。

[43][44][48][51] 《申报》1931 年 5 月 4 日；12 日；20 日；6 月 14 日

[46][50] 陈铭枢未刊回忆录稿。

[52] 转引自《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横排本，第 192 页。

[53] 引文据《“宁粤合作”亲历记》。但陈铭枢在该文说，邓演达被捕，他在江西军中不知道。事实上，邓之被捕，当时即在报上登有消息。似不应该不知道。这里据陈铭枢另一篇未刊回忆文稿中的说法。也许别有原因，一时未说真情。